

## 近五十年東漢末黨錮之禍研究概況（1961～2011）

趙文義\*

### 摘 要

在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對當時士族的探討一直都是十分熱門的主題，歷久不衰。由於士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佔有相當的影響力，足以與皇權分庭抗禮，在日本學界將之稱為「貴族」，因此也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稱為「貴族制時代」。對於魏晉南北朝士族的研究，除了探討士族在各個時期的作用與影響外，對士族的源流追本溯源亦是重要課題之一；根據中日學者的研究，魏晉南北朝士族的源流，應該追溯至東漢末年黨錮之禍中的士大夫。據此，筆者欲對近五十年以來的黨錮之禍相關研究作一簡單的回顧，並試圖從中檢視黨錮之禍方面研究的不足之處。

關鍵詞：東漢、黨錮之禍

---

\*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 一、前 言

在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對當時士族的探討一直都是十分熱門的主題，歷久不衰。由於士族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佔有相當的影響力，足以與皇權分庭抗禮，在日本學界將之稱為「貴族」，因此也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稱為「貴族制時代」。<sup>1</sup>對於魏晉南北朝士族的研究，除了探討士族在各個時期的作用與影響外，對士族的源流追本溯源亦是重要課題之一；根據中日學者的研究，魏晉南北朝士族的源流，應該追溯至東漢末年黨錮之禍中的士大夫。<sup>2</sup>據此，筆者欲對近五十年以來的黨錮之禍相關研究作一簡單的回顧，並試圖從中檢視黨錮之禍方面研究的不足之處。

## 二、1960～1970 年代：黨人活動研究

1963 年，金發根在史語所集刊發表了〈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一文，文中對東漢黨人的家世、門生故吏關係、地域、出身途徑等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提及其風尚、政治主張、後期發展等等，可

---

<sup>1</sup> 日·川勝義雄著，徐谷芄、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一章〈貴族政治的成立〉，頁 3-17、第四章〈貴族制社會的成立〉，頁 53-82。

<sup>2</sup> 劉顯叔，〈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簡牘學報》，5（臺北，1977），頁 213-244。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5-52。唐長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53-63。川勝義雄著，徐谷芄、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劉蓉，〈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說是對東漢末年的黨錮人物作了相當全面性的分析。<sup>3</sup>金氏此文是黨錮之禍作為獨立研究課題的里程碑，然而其分析大多是對史料的歸納，論述的部分較為缺少或不夠深入，為其可惜之處。

1970年代關於黨錮之禍的研究，則有劉元虹的〈東漢士人的救國運動〉以及劉顯叔的〈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兩篇文章。劉元虹從「救國」的角度討論了東漢初期以來的士人發展，並認為太學是士人活動的中心，也是進行清議的主要場所；東漢末黨人名聲的建立，其實是被當時腐敗的國家激化而形成的。<sup>4</sup>劉顯叔認為，東漢末的清流士大夫結黨尚未有地域、身份的差別，乃是包容廣闊的清流社會。黨錮之禍後，清流勢力開始有價值觀與意識型態上的分化，士大夫之間的交遊與臧否，逐漸形成浮華的風氣，反對這種風氣的則是儒學禮法大族。因此，魏晉時期的政爭，便是士大夫與儒學禮法大族對政治領導權的爭奪。<sup>5</sup>

上述兩篇文章中，劉元虹與金發根之文相似，都是偏向歸納史料式的分析，論述部分較為缺乏；論述立場上則較偏向東漢士人，對東漢的政局則是採取較負面的評價。劉顯叔則觀察到東漢末清流士大夫社會與魏晉士大夫社會的不同，但在提到司馬氏成為儒家大族代表之時，卻沒有論述司馬氏與其他家族的橫向連結；對於清流到儒家大族的轉換，如曾為「俗儒所譏」的荀氏如何成為儒家大族的歷程，在論述上也顯得稍嫌不足。

---

<sup>3</sup> 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下（臺北，1963），頁505-558。

<sup>4</sup> 劉元虹，〈東漢士人的救國運動〉，《嘉義師專學報》，5（嘉義，1974），頁265-298。

<sup>5</sup> 劉顯叔，〈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頁213-244。

### 三、1980 年代：黨錮研究的多元發展

1980 年代起，黨錮之禍研究明顯增多，且呈現出從各個角度對黨錮事件、黨人進行研究的多樣性。關於黨錮之禍與士風轉變的分析方面，馬良懷在〈論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中認為，黨錮之禍的原因在於士大夫因為階級的侷限性，產生了知識上的偏差，誤解了東漢末農民起義的目的，而將矛頭指向了外戚與宦官。接著，馬氏從宦官與士大夫的行為著手分析，認為黨錮之禍是腐朽勢力對進步勢力的迫害。另外，馬氏也指出黨錮禍後，東漢士風由倜儻直進取轉向了虛無荒誕。<sup>6</sup>馬氏對於士大夫因階級導致的知識偏差並沒有詳細說明，似乎忽略了東漢末士大夫的自主性，以及對當時時局的理解。又，關於東漢士風的轉變，也忽略了曹魏時期士風的演變，直接從東漢末年跳至魏末晉初。對於馬氏對漢晉之際士風轉換的看法，應該還有可以商榷的地方。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則有余英時的精彩論述，可做為參考。<sup>7</sup>

關於東漢末黨人出身與活動的研究，有唐長孺的〈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一文。唐氏論證了東漢末的黨人多出於大姓名士，而這些大姓名士是控制地方的力量、是漢末各個政權的統治基礎、是社會上最有活動力的集團。最後，藉由曹魏時期所施行的選舉制度，

---

<sup>6</sup> 馬良懷，〈論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83 年第 4 期（武漢，1983），頁 33-40。

<sup>7</sup> 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1980），頁 329-372。

大姓名士便成為構成魏晉士族的基礎。<sup>8</sup>唐氏的研究與金發根對黨錮人物出身進行分析的研究具有呼應性，皆認為黨人出身多為地方大姓或冠族。然而須注意的是，唐氏文中大姓名士並非全是黨人，且黨人、名士中亦不少出身貧微之人。日後成為魏晉士族者反倒少見大姓名士，出身貧微的名士亦所在多有。

陳啟雲則是留意到了清議之風的思想脈絡與黨錮之禍後的黨人活動。在〈關於東漢史的幾個問題——清議、黨錮與黃巾〉一文中，陳氏首先討論了東漢末清議之風的內在理路，認為東漢士大夫的革命易代思想之淵源十分久遠，並非一時興起之思潮，並且還點出了清議並非大公無私的非議時政，其中也有個人恩怨和利害因素。接著，陳氏認為黨錮之禍後的黨人名士並非束手就縛，而是可能有一部份人參與了黃巾起事的活動；即使不是直接參與其中，在心態上也是同情黃巾成員的。但是當黨人們看到黃巾起事的破壞性時，又毅然改變態度去鎮壓黃巾。<sup>9</sup>陳氏在此肯定了黨人自發性的批判和自我反省能力，也鮮明地呈現出漢晉之際士人活動的連續面。然而，東漢末的清議有很大的部分是在品評人物，而非僅是諷議時政，因此清議與革命易代思想的連結，應該還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此外，陳氏論述黨人參與黃巾的史料也不夠明確，還有待更多的史料來進一步映證這個想法。

羅彤華在其〈東漢黨人之士氣與義行——兼論黨錮之禍的起

<sup>8</sup> 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頁 25-52。

<sup>9</sup> 陳啟雲，〈關於東漢史的幾個問題——清議、黨錮與黃巾〉，《漢晉六朝文化·社會·制度——中華中古前期史研究》（臺北：新文豐，1996），頁 55-74。原載於《燕園論學集——湯用彤先生九十年誕辰紀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

因〉一文裡，關注的是東漢末黨人重「義」的一面。羅氏認為黨人有修持高節、以天下為己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特色，且其「義行」與遊俠之「不入於道德」不同，乃是高度道德規範下所做的行為。<sup>10</sup>羅氏此文與劉元虹相似，皆是正面肯定了東漢末黨人的道德價值，但不同的是羅氏著重於黨人之間的風氣與義行，劉氏則著重於黨人對朝廷、國家政策的抗爭與諫議。由於羅氏在此文高度讚揚黨人的行為，不免令人有太過偏頗黨人而忽略其他層面的感受；且此文題目雖有「兼論黨錮之禍的起因」，但在內容中並沒有太多著墨於這方面的討論，不免令人感到可惜。

金春峰的〈漢末經學的衰落與黨錮之禍〉一文，是從經學的角度討論黨錮之禍的發生。金氏認為漢代經學的基礎是士族，而黨錮之禍對士族的打擊使得經學走向衰落，於是士族走向逃避政治的清談玄遠，學術上也從經學走向玄學。<sup>11</sup>金氏從經學發展的角度討論黨錮之禍，確實為黨錮之禍研究開啟了觀察的新視角，提供了不同的思考取向。然而，金氏似乎太過重視漢晉學風由經學入玄學的一面，認為經學的衰落即是士族的衰落。事實上，如前述陳啟雲之文所言，漢末士人並沒有在黨錮之禍後一蹶不振，反而在魏晉時期蓬勃發展，顯然士族在學術取向上並不是與經學緊密結合，而是因時局而有所取捨。曹魏時期為了打擊浮華派的士人，多次提倡經學，故經學也並非在黨錮後立即衰落。因此，經學衰落的轉折點是否是

---

<sup>10</sup> 羅彤華，〈東漢黨人之士氣與義行——兼論黨錮之禍的起因〉，《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1：11（臺北，1988），頁 17-23。

<sup>11</sup> 金春峰，〈漢末經學的衰落與黨錮之禍〉，《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 501-515。

黨錮之禍，似乎還有尚待討論的空間。

顯然地，從 1980 年代開始，黨錮之禍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課題而逐漸受到重視，其研究視角也呈現多元化的現象。如士風演變、黨人活動、思想脈絡、行為舉止、經學關係等等，開展了日後黨錮之禍問題的研究方向。

#### 四、1990 年代：地域研究的開展

1990 年代的黨錮之禍研究，開始出現探討黨人與地域社會關係的趨勢。1991 年，胡寶國的〈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一文可說是開黨錮之禍與地域關係研究之先河。胡氏注意到了魏晉時人皆重視汝南、潁川士人的現象，而這批汝潁士人大多有著熱衷於政治的傾向。在黨錮之禍中，由於汝潁名士居於黨人的核心而為世人所知，成為當時士人的領袖。兩次黨錮後，汝潁士人雖沈寂了一段時間，但很快地又再度復興。然而在玄學思潮興起之後，汝潁士人不再佔有優勢地位，逐漸走向衰落。最後，胡氏提到雖然潁川荀、陳兩家在晉代仍有其顯赫地位，但其所依靠的是家族的力量，與汝潁地區的學術風氣無關；在士族政治的時代，地區已遠不如家族來的重要了。<sup>12</sup>胡氏的研究可說是建築在金發根對黨人的地域分析之上，且在黨人活動方面為唐長孺、陳啟雲的觀點做出補充。

此後，汝潁地區士人的活動便成為黨錮之禍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在胡寶國之後，有王曉毅的〈東漢安順之際的汝潁名士〉<sup>13</sup>、〈王

<sup>12</sup> 胡寶國，〈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歷史研究》，5（北京，1991），頁 127-139。

<sup>13</sup> 王曉毅，〈東漢安順之際的汝潁名士〉，《山東大學學報》，2（山東，1992），

龔與汝南名士》<sup>14</sup>、黃宛峰的〈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始末〉<sup>15</sup>等等，皆是探討汝潁地區的士人風氣與黨錮之禍關係的相關研究。王氏討論汝潁名士時，將時間點提前到東漢安帝、順帝之時，並認為王龔在漢安帝時就任汝南太守的這件小事，事實上正是造成東漢末士人勇於對抗朝廷，演變成黨錮之禍的序幕。王龔在擔任汝南太守時，起用了陳蕃和黃憲兩個當地名士——兩者正好可代表當時在朝與在野兩種士人的思想——在兩人之中，黃憲的聲望甚至是高於陳蕃的。王氏認為，當時名士們對黃憲的景仰，其實反映了漢魏之際儒、道融合的趨勢；汝潁名士對「中庸」與「道體」貫通、儒道兼綜之理想人格的仰慕是朦朧且不自覺的，而這正是百年後玄學思潮的出發點。此外，漢末的汝南名士皆不約而同做出反抗禮教、違背規範的行為，而這正好與阮籍等人的反禮教行為相呼應，再次證明了王氏認為汝南名士為玄學思潮源頭的觀點。<sup>16</sup>事實上，王氏此文雖然探討了汝潁地方的士人，但其論述主體則是在漢晉之際學風的思想脈絡，在某個程度上修正了馬良懷和金春峰的看法。

黃宛峰在汝南、潁川之外，還加上了對南陽士人的討論。黃氏認為此三郡在地理位置上相毗鄰，民風民俗上也有相似之處。三郡士風活躍，位置又鄰近京師，使得三郡士人對政治格外敏感，積極

---

頁 1-8。

<sup>14</sup> 王曉毅，〈王龔與汝南名士〉，《孔孟月刊》，35：1（臺北，1995），頁 45-51。

<sup>15</sup> 黃宛峰，〈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始末〉，《中國史研究》，4（北京，1995），頁 128-137。

<sup>16</sup> 王曉毅，〈東漢安順之際的汝潁名士〉，《山東大學學報》，2（山東，1992），頁 1-8。同氏，〈王龔與汝南名士〉，《孔孟月刊》，35：1（臺北，1995），頁 45-51。



參與時政。三郡士人彼此之間有著婚姻、世交、門生故吏、太學學友等錯綜複雜的關係，這種複雜的社會網絡，提升了三郡名士的社會地位。文化傳統與地理位置因素的交織，讓潁川、汝南、南陽士人在東漢末時成為黨人的核心，聲望扶搖直上。<sup>17</sup>黃氏此文扣緊了地理環境與黨人關係的討論，是探討黨人與地域的代表作品。黃氏在文中修正了胡寶國認為汝潁名士是因為「特殊的政治時機」而興起的說法，認為汝潁南陽士人在地理上便有對政治感到敏感的先天優勢。然而，黃氏過度看重黨人結黨的行為，認為他們「不妥協於邪惡勢力」；但正如前述陳啟雲所言，黨人結黨並非全然大公無私，而是有其個人恩怨與利益的因素。因此，黃氏對於黨人結黨的看法似乎太過偏頗。

陳勇的〈涼州三明論〉將視角拉到了王朝邊緣的涼州，探討當漢末黨人運動風起雲湧時，「涼州三明」作為邊州士人代表，<sup>18</sup>在參與中央朝政時所遇到的困境與分歧。陳氏認為涼州三明在黨錮事件中的分歧，說明了他們與中原士人有著嚴重的隔閡；涼州士人要突破地域，只能選擇放棄軍事實力任人擺佈，或是以軍事力量去控制中央。<sup>19</sup>陳氏觀察到了黨錮之禍中邊陲地區人物的活動，擴展了黨錮之禍與地域關係結合的內容，十分難能可貴。此外，陳氏亦點出了黨錮之禍雖然牽連諸州士人，但中原士人對邊州士人的排他性與邊州士人對中原士人的仰慕，是分析黨錮士人群體時不可忽視的一

---

<sup>17</sup> 黃宛峰，〈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始末〉，《中國史研究》，4（北京，1995），頁 128-137。

<sup>18</sup> 所謂「涼州三明」，指的是皇甫規、張奐、段熲三人。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熲，字紀明。

<sup>19</sup> 陳勇，〈涼州三明論〉，《中國史研究》，2（北京，1998），頁 37-48。

環。

除了上述以地域社會關係為切入點的黨錮研究外，還有高兵從皇權的視角論述黨錮之禍的〈東漢末皇權對三大政治集團的態度〉一文。不同於以往認為東漢末年桓、靈二帝昏庸無能的觀點，高氏認為桓、靈二帝試圖平衡士大夫、外戚、宦官三大政治集團的力量，以維護皇權。桓、靈二帝之時雖然發生了黨錮之禍，但同時也有著打擊外戚和宦官的「外戚之禍」、「宦官之禍」；桓、靈二帝所要打壓的對象，其實是威脅到皇權的任何一個政治集團。因此，黨錮之禍並非宦官對士大夫的迫害，而是皇帝為了維護皇權而與士大夫所產生的衝突。<sup>20</sup>高氏此文重新檢視了士大夫與宦官間的關係，認為皇帝才是造成黨錮之禍的重要因素，可說是相當持平的觀點。然而東漢末的外戚在梁冀之後，已經沒有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的家族，較著名的竇武、何進都不比鄧氏、閻氏、梁氏等顯赫，因此外戚勢力在桓、靈二帝時似乎沒有太大的政治力量，無法左右朝政。而三大集團之間的關係和與皇權之間的連結，高氏也沒有進一步的論述，尚有持續研究的空間。

## 五、21 世紀後：新方向的探索

1990 年代末期，黨人與地域關係的研究熱潮逐漸減退。進入 21 世紀的黨錮之禍研究走向較為零散，大致上是以探討黨人的精神層面，或是嘗試從新角度觀察黨錮事件的發生為主要的兩個趨勢。

---

<sup>20</sup> 高兵，〈東漢末皇權對三大政治集團的態度〉，《齊魯學刊》，5（山東，1998），頁 79-82。

關於黨人的精神層面研究，有蔡明倫與黃宛峰兩位學者。蔡明倫的〈東漢後期黨錮之禍與天人感應神學的衰微〉一文認為，東漢末的兩次黨錮之禍，打擊了漢代士人自董仲舒以來的「天人感應」核心精神，使得士人入世熱情消退，其價值觀也走向崩潰，因此才有日後魏晉玄學的新思想風潮出現。<sup>21</sup>黃宛峰的〈東漢黨人與士大夫精神〉、〈古代黨人的生死觀與士大夫精神〉則是認為，黨錮之禍中的黨人所表現出的精神與氣節，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甚至奠定了中國歷代士大夫的獨立精神。<sup>22</sup>其中，蔡氏雖然探討了黨錮之禍對漢末士人價值觀的破壞，但是對於新價值觀的出現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且忽略了曹魏時期流行才性之辨思潮的事實，認為在兩次黨錮之後直接轉入了玄學思想。這似乎漠視了史實的情況，以及缺少了魏晉思想史方面的學術累積。黃氏的論點肯定了東漢末黨人的精神面，但是其討論的是形而上的「精神傳承」，並沒有闡述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因此也是較缺乏學術累積的觀點。

從新角度討論黨錮之禍的學者，則以張娟與秦綦為代表。張娟的〈東漢末黨錮之禍新解〉、〈重釋東漢黨錮〉兩篇文章中拋棄了以士大夫為中心的思維，從當時宦官的立場出發做論述。張氏認為，宦官代表了下層民眾，黨錮之禍乃是「下層民眾為了爭取向上流動，並重新建立政治人物標準」的一種努力。宦官雖然沒有「明經之才」，但在文辭、司法、軍事等方面皆有所表現，並非一無是處。

<sup>21</sup> 蔡明倫，〈東漢後期黨錮之禍與天人感應神學的衰微〉，《湖北師範學院學報》，19：4（湖北，1999），頁 26-30、59。

<sup>22</sup> 黃宛峰，〈東漢黨人與士大夫精神〉，《人文雜誌》，1（陝西，2000），頁 84-88。  
同氏，〈古代黨人的生死觀與士大夫精神〉，《中州學刊》，6（河南，2003），頁 116-119。

當皇帝對士大夫階層感到威脅時，宦官的新人物標準便應運而起，兩者衝突的結果便釀成了黨錮之禍。<sup>23</sup>張氏試圖突破以往的框架，從新的角度檢視黨錮之禍，給予宦官理解與同情，然而，其認為宦官代表下層民眾的觀點卻有很大的盲點。與士大夫相較，宦官的出身的確是低微許多，但是這並不代表宦官能夠代表下層民眾。《後漢書·黨錮列傳》中對當時宦官及其親族的描述，大多是危害百姓的行為，如張讓之弟張朔「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sup>24</sup>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等，<sup>25</sup>由此看來，宦官並非與百姓站在同一陣線，反而是站在其對立面；從史實上來看，站在下層民眾一方的，反而是士大夫階層。從這一點來看，張氏觀察黨錮之禍的切入點雖然十分具有新意，但卻忽略了史實的層面，反而給人一種「為新解而新解」的感受。

秦綦的〈溯源與追憶：東漢黨錮新論〉則是從「歷史記憶」的角度探討黨錮之禍的書寫。秦氏認為，黨錮之禍並不是東漢末士大夫受到宦官迫害的事件，而是漢桓帝即位後，對當初支持清河王劉蒜即帝位之士人群體的一次報復行動。但日後的歷史記憶及史家書寫，只注意到了士大夫與宦官對抗的高道德面，卻忽略了漢桓帝對其反對派報復的黑暗面。<sup>26</sup>事實上，秦氏對黨錮之禍時皇帝所扮演之角色的觀察，與前述高兵對當時皇權的討論可以相互呼應，兩者

<sup>23</sup> 張娟，〈東漢末黨錮之禍新解〉，《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3：4（廣東，2003），頁 58-62。同氏，〈重釋東漢黨錮〉，《雲南師範大學學報》，37：1（雲南，2005），頁 37-44。

<sup>24</sup> 劉宋·范曄著，《後漢書》，卷 67，〈黨錮·李膺傳〉（臺北：鼎文書局，1981），頁 2194。

<sup>25</sup> 《後漢書》，卷 67，〈黨錮·張儉傳〉，頁 2210。

<sup>26</sup> 秦綦，〈溯源與追憶：東漢黨錮新論〉，《史林》，3（上海，2008），頁 28-33。

皆是看到黨錮之禍時，皇帝並不是被宦官所蒙蔽，而是有其主動性的一面；秦氏更進一步認為黨錮之禍是漢桓帝對其反對派的報復。秦氏對歷史記憶、歷史書寫的討論，似乎是近年來對黨錮之禍、東漢黨人名士研究的新趨勢，在日本也有一些學者針對這方面進行研究。<sup>27</sup>無奈筆者礙於學力不足，無法在此對日本學界的成果做進一步的介紹。

## 六、近期專書與論文

在近年來的專書方面，劉蓉的《漢魏名士研究》中有〈名士與黨錮〉一節，認為東漢時期「三李杜」與皇權的對抗，<sup>28</sup>代表了作為政治菁英的名士與皇權背離，而這正是導致東漢崩潰的原因之一。此外，黨人名士中的汝南士人自光武帝以來便與皇權關係緊張，因此在漢末的黨人活動中居於領導地位，成為黨人的代表人物。黨錮之禍後，黨人雖然暫時失勢，但又以黃巾起事的鎮壓者之身份重新崛起；黨人的殘存者或其後裔，成為魏晉時期在政治上的重要角色。<sup>29</sup>至於學位論文方面，則有陳鏘懋的碩士論文〈漢靈帝時期的政局〉。其中的「士風的沈淪」一章，論及了東漢末的兩次

<sup>27</sup> 日・安部聡一郎，〈後漢時代關係史料の再検討——先行研究の検討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4（日本，2000），頁 1-43。同氏，〈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111：10（東京，2002），頁 1-30。另外，阿部幸信、佐藤達郎等人亦針對後漢時期的史料進行重新檢討。

<sup>28</sup> 「三李杜」分別是李固、杜喬；李雲、杜眾；李膺、杜密。

<sup>29</sup> 劉蓉，〈名士與黨錮〉，《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27-53。同氏，〈名士的重新崛起〉，《漢魏名士研究》，頁 54-75。

黨錮之禍。陳氏站在肯定黨人活動的高道德面，大力斥責宦官的行為；雖然文中提及了黨人活動對皇權的威脅，但更強調的是宦官對皇帝的蒙蔽。<sup>30</sup>上述二人在論述黨錮之禍時，都呈現出對以往研究成果的累積，但在立論上似乎沒有進一步的論點，實為可惜之處。除了上述二氏之外，牟發松最近有〈俠儒論：黨錮名士的淵源與流變〉一文，將東漢黨人群體視為「帶有俠風的儒」，認為黨錮名士的行為與活動乃是淵源於自戰國以來遊走於國家體制之外的俠。然而這樣的俠風在兩次黨錮之禍後受到打擊，在行為上逐漸走向妥協的權謀派，思想上則慢慢對時局感到絕望，以致於有任誕行為的出現。而如此的變化，正是魏晉名士出現的契機。<sup>31</sup>牟氏之文提出了「俠儒」一詞，認為黨錮名士皆有俠風，並列舉了一些黨人與遊俠的共通點。然而若一一檢視黨錮名士之事蹟，則會發現其行動與思想並非全然一致，「俠」的概念可以套用於某些人身上，但若放在另一群黨錮名士身上，則不盡然適用。此外，牟氏認為黨人是「處於體制外或反體制的組織、群體」，<sup>32</sup>但大多數的黨人皆在東漢朝廷為官，在中央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在地方亦有冀州刺史蔡衍、山陽太守翟超。他們並不反對東漢朝廷這個體制，而是反對宦官對體制的破壞。因此，黨錮名士在行為上固然帶有俠風，但並非人人皆是如此，在個別情況上應該還要再進一步梳理、討論。

---

<sup>30</sup> 陳鏘懋，〈漢靈帝時期的政局〉，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文（嘉義：國立嘉義大學，2007），頁 16-32。

<sup>31</sup> 牟發松，〈俠儒論：黨錮名士的淵源與流變〉，《文史哲》，325（山東，2011），頁 64-85。

<sup>32</sup> 牟發松，〈俠儒論：黨錮名士的淵源與流變〉，頁 78。

## 七、未來展望

以上是近五十年來學界對於東漢末黨錮之禍的研究動向與趨勢。雖然還有許多討論東漢末士風，或是東漢末政治局勢的文章會提及黨錮之禍的相關內容，但其觀點大多不脫上述文章的範圍。整體來看，關於黨錮之禍的研究似乎已快達到飽和的階段，但筆者認為，應該還有幾個尚待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第一，關於黨錮之禍時，汝穎、南陽地區以外的士人之活動。如前述的陳勇探討涼州士人與中原士人的隔閡性一般，在中原地區以外的冀州、益州等其他地域的士人們，在面對黨錮之禍時表現出了什麼樣的意向，或是如何看待黨錮之禍的發生等等，應該都是有待研究的課題。

第二，在《後漢書·黨錮列傳》中所列名的「天下名士」三十五人，以及受黨錮牽連的士大夫們，其實是一個複雜的群體，有著某個程度的異質性。就身份階層來看，有「家世冠族」<sup>33</sup>的羊陟（八顧之一），也有「家貧，不修學行」<sup>34</sup>的度尚（八廚之一）；就行為來看，也有「逸民派」與「權道派」的區別。<sup>35</sup>因此，對於這些黨

<sup>33</sup> 《後漢書》，卷 6767，〈黨錮·羊陟傳〉，頁 2209。

<sup>34</sup> 《後漢書》，卷 38，〈度尚傳〉，頁 1284。

<sup>35</sup> 根據川勝義雄的研究，「逸民派」指的是在東漢末不參與政治，甚至有時會批判黨人活動的一群人；而「權道派」指的是不像黨人有鮮明立場，也不同于逃離現實的逸民，是站在第三種立場，「以權道對正道」的一群人，是東漢末以後創立新時代的勝利者。參見吉川忠夫著，王啟發譯，〈范曄與東漢末期〉，《六朝精神史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 143-151。川勝義雄，〈貴族制社會的成立〉，《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頁 53-82。

人士大夫做較深入的細部考察，乃是黨錮之禍研究中可以再進一步開發的課題之一。

第三，關於宦官與漢末士大夫的關係。以往對黨錮之禍的討論，大多認為黨人名士與宦官是站在水火不容的對立面，然而事實上，不少宦官與黨人名士是有關連的。如曹騰「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sup>36</sup>、樂巴「(陳)蕃、(竇)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sup>37</sup>；甚至有不少宦官有「清忠」之名。<sup>38</sup>宦官中有「清」者，則漢末士大夫中或許也存在著「濁」者，因此黨錮之禍時的士大夫與宦官之關係，並不是以「清濁對立」就能一言以蔽之，而是存有許多能夠再深入探討的空間。

黨錮之禍在東漢史研究中是個重要的議題，學界長年以來從士風、地域、精神層面等各個角度切入觀察，已有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但仍有可以再深度研究的空間。就士人的自主性來看，黨錮之禍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從士人倚靠皇權才得以發展，到「良禽擇木而棲」的自由擇主——黨錮之禍正是其中轉變的關鍵所在。未來的黨錮之禍研究，應該要逐漸擺脫以往從群體觀察的視角，走向重視個人的自主性與差異的研究角度，並與地域研究結合，以求更深化、細緻化黨錮之禍研究的內容。如此一來，不僅能增加了關於黨錮之禍的研究成果，也能為東漢史研究開展進一步的研究視角。

---

<sup>36</sup> 《後漢書》，卷 78，〈宦者·曹騰傳〉，頁 2519。

<sup>37</sup> 《後漢書》，卷 57，〈樂巴傳〉，頁 1842。

<sup>38</sup> 如呂強「為人清忠奉公」；丁肅、徐衍、郭耽、李巡、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可參見《後漢書》，卷 78，〈宦者·呂強傳〉，頁 2533。



### 參考文獻（依作者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川勝義雄著，徐谷芄、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王曉毅，〈東漢安順之際的汝潁名士〉，《山東大學學報》，2（濟南，1992），頁 1-8。
- 王曉毅，〈王龔與汝南名士〉，《孔孟月刊》，35：1（臺北，1995），頁 45-51。
- 安部聡一郎，〈後漢時代關係史料の再検討——先行研究の検討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4（日本，2000），頁 1-43。
- 安部聡一郎，〈党錮の「名士」再考——貴族制成立過程の再検討のために〉，《史学雑誌》，111：10（東京，2002），頁 1-30。
- 牟發松，〈俠儒論：黨錮名士的淵源與流變〉，《文史哲》，4（濟南，2011.12），頁 64-85。
- 余英時，〈名教危機與魏晉士風的演變〉，《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1980。
- 金春峰，〈漢末經學的衰落與黨錮之禍〉，《漢代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 501-515。
- 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4 下，1963，頁 505-558。
- 胡寶國，〈漢晉之際的汝潁名士〉，《歷史研究》，5（北京，1991），頁 127-139。

- 高兵，〈東漢末皇權對三大政治集團的態度〉，《齊魯學刊》，5（曲阜，1998），頁 79-82。
- 唐長孺，〈東漢末期的大姓名士〉，《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25-52。
- 秦綦，〈溯源與追憶：東漢黨錮新論〉，《史林》，3（上海，2008），頁 28-33。
- 馬良懷，〈論東漢後期的黨錮之禍〉，《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武漢，1983），頁 33-40。
- 陳勇，〈涼州三明論〉，《中國史研究》，2（北京，1998），頁 37-48。
- 陳啟雲，〈關於東漢史的幾個問題——清議、黨錮與黃巾〉，《漢晉六朝文化·社會·制度——中華中古前期史研究——》，臺北：新文豐，1996，頁 55-74。
- 陳鏘懋，《漢靈帝時期的政局》，國立嘉義大學史地學系碩士論文，嘉義：國立嘉義大學，2007。
- 黃宛峰，〈東漢潁川、汝南、南陽士人與黨議始末〉，《中國史研究》，4（北京，1995），頁 128-137。
- 黃宛峰，〈東漢黨人與士大夫精神〉，《人文雜誌》，1（陝西，2000），頁 84-88。
- 黃宛峰，〈古代黨人的生死觀與士大夫精神〉，《中州學刊》，6（中州，2003），頁 116-119。
- 張娟，〈東漢末黨錮之禍新解〉，《惠州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3：4（惠州，2003），頁 58-62。
- 張娟，〈重釋東漢黨錮〉，《雲南師範大學學報》，37：1（昆明，2005），

頁 37-44。

劉元虹，〈東漢士人的救國運動〉，《嘉義師專學報》，5（嘉義，1974），  
頁 265-298。

劉蓉，《漢魏名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劉顯叔，〈東漢魏晉的清流士大夫與儒學大族〉，《簡牘學報》，5（臺北，1977）。

蔡明倫，〈東漢後期黨錮之禍與天人感應神學的衰微〉，《湖北師範學院學報》，19：4（黃石，1999），頁 26-30、59。

羅彤華，〈東漢黨人之士氣與義行——兼論黨錮之禍的起因〉，《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1：11（總 248），1988，頁 17-23。。

